

# 国家脆弱性的社会历史根源：以刚果（金）为中心的考察<sup>\*</sup>

闫 健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非洲国家发展遭遇严重困难，这反映出被平等的主权国家资格所掩盖的国家脆弱性问题。借鉴“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并基于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本文阐述了刚果（金）在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碎片化社会控制”形成和固化的历史经历，同时讨论了为何“碎片化社会控制”最终成为独立后刚果（金）国家构建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的障碍。本文的论述表明，国家构建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会受到特定社会历史经历的极大制约。正因如此，对脆弱国家的研究必须把“历史”带进来。

**【关键词】** 刚果（金）；“社会中的国家”；殖民统治；社会控制；酋长

**【作者简介】** 闫健，副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为非洲比较政治和国家构建问题（北京，100089）。

非洲去殖民化运动的一个深远影响就是使民族国家成为现代非洲政治版图的基本单元。去殖民化运动使非洲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主权国家地位，第一次以“平等主体”的身份参与到国际体系中来，

---

<sup>\*</sup>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非洲马克思主义政权比较研究”（项目编号：22BZZ003）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非洲马克思主义研究及代表人著作译介”（项目编号：22&ZD019）的阶段性成果。感谢《非洲研究》评审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新生的非洲主权国家进而成为非洲国际体系的基石。然而,冷战的终结以及非洲国家战略地位的下降,最终揭示了被平等的主权国家资格所掩盖的非洲国家脆弱性问题。20 世纪 90 年代,非洲国家发展遭遇严重困难,索马里、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刚果(金)等国相继出现了中央政府丧失对“合法使用暴力的垄断权”的状况,并造成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与外溢后果。如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所言,法律意义上的国家资格原本是为了维护全球和平和秩序,但是,它对脆弱国家的保护却最终走向了目标的反面。<sup>①</sup>大量的非洲国家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也使得对国家脆弱性的讨论成为学术界的一门显学——“国家为何会失败”成为若干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的标题。

本文并不尝试从一般意义上寻求非洲国家脆弱性的原因何在。相反,本文以刚果(金)<sup>②</sup>为案例,致力于从国家构建的长历史视野探究后独立时期刚果(金)的国家构建为何举步维艰这一核心问题。在国际学术界,刚果(金)一直都被认为是脆弱国家的典型。蒙博托时期的刚果(金)(1965~1997)经历了从国家构建到国家崩溃的整个过程。自 1997 年蒙博托政权崩溃之后,刚果(金)便陷入了持续性的混乱和内战之中,造成了惨痛的人道主义灾难。世纪之交,刚果(金)的两次内战共使 550 万人遇难,造成了难民潮、践踏基本人权等人道主义后果。<sup>③</sup>国家崩溃还带来长期的经济社会后果。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2020》的统计,在全球 189 个国家和地区中,2019 年刚果(金)的人类发展指数仅排名第 175 位。<sup>④</sup>“脆弱国家指数”是美国和平基金会衡量国家失效风险和脆弱性的权威指标。2021 年,刚果(金)在“脆弱国家指

① Christopher Clapham, *Africa and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Politics of State Surviv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9.

② 比属刚果(Belgian Congo)在 1960 年独立时国名改为刚果共和国,因其首都为利奥波德维尔,便简称刚果(利);后于 1964 年改为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利奥波德维尔改名为金沙萨,所以简称刚果(金)。1971 年,蒙博托改国名为扎伊尔共和国。1997 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后,国名又重新改回刚果民主共和国。如无特殊说明,本文以刚果(金)作为统一指代。

③ Rene Lemarchand, *The Dynamics of Violence in Central Africa*,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1, p. IV.

④ 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https://hdr.undp.org/data-center/specific-country-data#/countries/COD>. Accessed 2022-06-09.

数”排行榜上高居全球第五位，属于“极度警惕”类别。<sup>①</sup>

具体言之，本文从“社会中的国家”（State in Society）的理论视角，初步探究刚果（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如何形成和固化，并最终成为独立后国家构建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障碍。换言之，国家构建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会受到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经历的极大制约。诺斯指出，历史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时间代表了理念、制度和信念演进的维度”。<sup>②</sup>更进一步，社会科学中任何理论构建的努力都必须考虑到时间维度，“必须基于对于历史的深刻理解之上”。<sup>③</sup>与社会科学中的“历史转向”趋势相一致，众多研究欧洲近代国家构建的学者已将关注视野回溯到了中世纪晚期。<sup>④</sup>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将简要梳理关于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研究文献，归纳其主要观点与不足；第二部分介绍“社会中的国家”的理论视角并阐明为何它是分析脆弱国家的一个有效理论工具；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分别论述刚果（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历史经历如何造就并加剧“碎片化社会控制”，同时讨论其对后独立时期国家构建进程的长期影响；最后是文章的结语。

## 一 文献综述

自1972年让-克劳德·威拉姆（Jean-Claude Willame）出版《家产制与刚果的政治变迁》（*Patrimoni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go*）一书后，学术界对于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讨论就一直没有中断过。这些讨论在1997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后达到了一个高潮。从内容上看，这些讨论的重点均是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根源。概而言之，研究者

① The Fund for Peace, “Country Dashboard: Congo Democratic Republic”, <https://fragilestatesindex.org/country-data/>. Accessed 2022-06-09.

② Douglass North, “In Anticipation of the Marriage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heory”, in James Alt et al., eds., *Competition and Cooperation: Conversations with Nobelists about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9, p. 316.

③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

④ 典型的例子包括 Joseph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们将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根源归结为两个方面。

第一,家产制。在韦伯对政治权威的类型划分中,家产制(Patrimonialism)<sup>①</sup>属于传统型权威的一种亚类型。在家产制下,整个统治体系由忠诚或亲族联系而非由科层或明晰的管理职能连接到一起。与法理型权威相比,家产制下的权威被赋予个人而非公职人员。与克里斯马型权威相比,家产制下的权威深深嵌入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中,而非(像克里斯马型权威那样)超脱于社会之外。简言之,在家产制权威下,所有的权力关系都是个人关系,不存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实质性区别。蒙博托在刚果(金)政治中的绝对主导地位这一事实,使得一些研究者选择通过家产制概念来理解刚果(金)政治体系内在的脆弱性。威拉姆将蒙博托的政治主导地位称为“官僚恺撒主义”(Bureaucratic Caesarism),官僚恺撒主义基于蒙博托个人对国家政治和精英的严密控制之上。<sup>②</sup>托马斯·加拉吉(Thomas Callaghy)以“家产制行政国家”(Patrimonial Administrative State)指代蒙博托构建的家产制网络。在他看来,蒙博托通过家产制网络安抚和拉拢刚果(金)的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群体,尽管他并不试图完全摧毁它们。这被他称为“覆盖策略”。<sup>③</sup>借用诺斯等人提出的“有限准入秩序”概念,凯·凯泽(Kai Kaiser)和斯蒂芬妮·沃尔特斯(Stephanie Wolters)指出,为了维持其统治,蒙博托不得不榨取租金并在主导性同盟内部进行分配,这使得刚果(金)成为“有限准入秩序”的一个典型。<sup>④</sup>对于国家构建而言,家产制的优势是它能够以相对较小的成本迅速加强国家在领土范围内的主导,但这种主导往往是不稳定的:财政资源的耗竭、主导性同盟的分裂以及被排斥社会群体的不满都有可能动摇家产制的根基,进而导致国家构建进程的

① 国内学术界对 patrimonialism 一词有“家产制”“世袭制”“家长主义”等不同译法。本文选择《经济与社会》([德] 马克斯·韦伯著,阎克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中的译法,将其译为“家产制”。

② Jean-Claude Willame, *Patrimonialism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the Congo*,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131–134.

③ Thomas M. Callaghy, *The State-Society Struggle: Zair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xv.

④ Kai Kaiser and Stephanie Wolters, “Fragile States, Elites, and Rent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in Douglass North et al., eds., *In the Shadow of Violenc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Problem of Develop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06.

中断。<sup>①</sup>

第二，盗贼统治。一些研究者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盗贼统治”（kleptocracy）概念，用来描述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统治集团的掠夺行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国家出现的并不是真正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是国家阶级（state class），后者利用对国家机器的控制而谋取私利。盗贼统治的特征是腐败和资源浪费，它本质上是反发展的、腐朽的并最终会给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20 世纪 80 年代之后，随着蒙博托政权日渐衰朽，“盗贼统治”成为一些研究者分析刚果（金）国家衰败的理论工具。例如，彼得·科纳（Peter Körner）详细描述了蒙博托政权如何在刚果（金）建立起盗贼国家。在她看来，围绕在蒙博托周围的国家精英，是一群自私自利的人，他们都在肆无忌惮地侵吞国家的财富。<sup>②</sup> 罗伯特·罗特伯格（Robert Rotberg）认为蒙博托是导致刚果（金）滑向深渊的决定性人物，“将蒙博托与其他新家产制统治者区分开来的是他无与伦比的能力，可以将盗贼国家嵌入社会的每个角落，以及他将个人统治转化为个人崇拜、将政治庇护主义转化为任人唯亲的能力”。<sup>③</sup> 珍妮·哈斯金（Jeanne Haskin）将蒙博托称为“盗贼统治之父”。在她看来，蒙博托个人的盗窃行为导致了刚果（金）整个官僚体系的腐败。

仅对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分析而言，“家产制”概念强调的是统治者的统治策略，即蒙博托通过庇护网络构建了一个执政同盟；相比之下，“盗贼统治”概念突出的是执政精英的掠夺行为。它们反映了刚果（金）统治者在国家衰败的不同阶段的目标退化，即从维持执政同盟退化为赤裸裸的掠夺。另外，无论是“家产制”还是“盗贼统治”，都将分析的重点聚焦于行为体层面，倾向于突出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在导致国家脆

① 关于家产制的不稳定性，详见 Patrick Chabal and Jean-Pascal Daloz, *Africa Works: Disorder as a Political Instrumen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9; Crawford Young and Thomas Turn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Zaïre Stat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Robert Bates,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② Peter Körner, *Zaïre, Verschuldungskrise und IWF-Intervention in einer afrikanischen Kleptokratie*, Hamburg: Institut für Afrika-Kunde, 1988, 转引自 Gabi Hesselbein,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Congolese State: An Analytical Narrative on State-Making”, Working Paper, No. 21, 2007, Crisis States Research Centre, p. 4。

③ Robert Rotberg, *State Failure and State Weakness in a Time of Terror*,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2003, p. 31。

弱性方面的“能动性”，换言之，国家脆弱性是统治者“糟糕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倾向可能会低估统治者所面临的结构性约束与压力。至少在刚果（金）的案例中，将国家脆弱性的责任完全归咎为蒙博托个人是有失公允的。事实上，正是蒙博托 1965 年的政变终结了持续五年之久的刚果危机，而蒙博托执政的前十年也被认为是刚果（金）国家构建取得最大进步的时期。<sup>①</sup>

本文认为，对刚果（金）国家构建进程的深刻理解需要“把历史带回来”，具体分析特定的历史情境如何塑造了国家构建的特定轨迹。在国际学术界，历史情境塑造国家构建进程已是一项共识。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强调近代欧洲的地缘军事竞争是导致现代国家出现的重要推动力，如他所言，“发动战争、资源提取和资本积累共同塑造了欧洲的国家构建进程”。<sup>②</sup> 托马斯·埃特曼（Thomas Ertman）的研究表明，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地方政府的组织方式、持续性地缘政治竞争压力发生的时机以及代议制机构的性质和能力塑造了不同国家的构建轨迹。<sup>③</sup> 通过“社会中的国家”视角并在借鉴相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探究刚果（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碎片化社会控制”如何形成和固化，并最终成为独立后国家构建进程中不得不面对的结构性障碍。

## 二 “社会中的国家”：国家构建与对社会控制的争夺

“社会中的国家”的分析视角最初由米格代尔在《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一书中提出，后来在其《社会中的国家》一书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简言之，“社会中的国家”的分析视

① James Putzel et al., “Drivers of Change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and Challenges for Reconstruction”, Working Paper, No. 26, 2008, Crisis States Research Center, p. 3.

② Charles Tilly, “War Making and State Making as Organized Crime”, in Charles Tilly, ed.,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71.

③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6.

角包含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国家“内嵌于”社会。现代国家在本质上是一个强制性组织，它致力于实现对社会的主导，这意味着国家要凌驾于社会之上。另外，在实践中，国家又不得不“内嵌于”社会之中，无法与社会截然分开。米格代尔将国家的这种困境归纳为“国家同时脱离于社会，但又属于社会”。<sup>①</sup>因此，“社会中的国家”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矛盾性质。一方面，国家可以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形象、清晰的边界、统一的组织，能够作为一个单一行为体实现对社会的主导；另一方面，在实践层面，国家是由不同部分组成的松散的集合体，国家组成部分与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总是很清晰，国家不同部分很可能推行相互冲突的规则。<sup>②</sup>

第二，国家构建的实质是对“社会控制”的争夺。国家“内嵌于”社会的现实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双向度的，即国家在试图主导社会的同时，也面临来自社会的渗透和抵制，而国家构建的进程取决于国家在全社会推行“一致性规则”的能力。所谓推行“一致性规则”的能力，就是指国家机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期待它所确定的规则能够得到社会的自愿服从而不必诉诸强制力。<sup>③</sup>在米格代尔看来，国家成功推行“一致性规则”的结果就是带来了“社会控制”，即“民众社会行为的自身意愿、其他社会组织所寻求的行为都符合国家规则的要求”。<sup>④</sup>然而，国家并非总能成功实现“社会控制”，而是往往遭到既有社会群体的抵制。这是因为社会控制的基础在于控制个体的生存策略，而后者往往被掌握在既有社会群体和地方强人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构建的实质就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群体对“社会控制”的争夺，其核心在于“谁（国家还是社会群体）最终获得在社会中制定规则的权力和能力”。<sup>⑤</sup>

第三，社会结构是影响国家构建进程的基础性因素。所谓“社会结

①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63.

②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

③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0.

④ [美] 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24页。

⑤ [美] 乔尔·米格代尔：《强社会与弱国家：第三世界的国家社会关系及国家能力》，张长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第31页。

构”，即社会控制在国家与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布状况。由于国家构建的实质是对“社会控制”的争夺，因而，当社会控制在很大程度上被掌握在某些社会群体手中时，国家在全社会推行“一致性规则”必然会遭到抵制。反之，当社会群体无法行使实质性社会控制时，则国家推行“一致性规则”所遭遇的抵制和挑战将大幅削弱，国家构建的进程也会相对顺利。例如，在讨论 13 世纪英格兰国家构建历程时，约瑟·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指出，诺曼人在 11 世纪入侵摧毁了英格兰旧贵族的权力，由此导致英格兰缺乏强大的地方性制度安排，“这一事实提升了英格兰政府的效率，减少了对大规模专业行政人员的需要”。<sup>①</sup> 米格代尔指出，“社会结构——尤其是当存在众多能够行使有效社会控制的社会组织时——能够对国家切实提高自身能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sup>②</sup>

对于我们理解国家构建的历史进程而言，“社会中的国家”视角能带来一些明显的优势。首先，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构建路径的多样性与结果的开放性。一方面，由于每个国家所面临的社会结构和历史情境不同，因而它们的国家构建路径也可能不尽相同。即便是在 18 世纪的欧洲——现代国家的发源地——也曾出现家产式绝对主义、家产式宪政主义、官僚绝对主义和官僚宪政主义四种不同的国家构建路径。<sup>③</sup> 另一方面，既然社会结构是影响国家构建进程的基础性因素，假如既有社会结构下大量的社会控制由社会组织行使，则国家很可能在对“社会控制”的争夺中败下阵来。换言之，国家构建并非单向度的线性进程，而是存在被逆转和失败的可能性。其次，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构建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国家构建的实质是对“社会控制”的争夺，它不仅涉及国家和社会组织对规则制定权的竞争，而且涉及谁将为社会成员提供生存策略。换言之，国家构建不仅意味着社会控制从社会组织 and 地方强人手中转向国家，而且意味着社会成员为了适应国家的规则而重新调整自己的生存策略，这不啻一场社会革命。最后，它有助于我们理解国家构建的历史性。国家构建的实质是对“社会控制”的争夺，而一个社会

① Joseph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47.

②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4.

③ Thomas Ertman, *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R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9.

中既有“社会控制”的分布状况——米格代尔所说的“社会结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这就意味着，如若我们要深入理解一国国家构建历程，我们就必须探寻其既有“社会结构”形成的历史。这也是研究早期西欧民族国家兴起的学者们都关注中世纪晚期的西欧社会结构的原因，后者在公元 1000 年前后时终于伴随着欧洲封建制的成熟而稳定了下来。<sup>①</sup>

通过“社会中的国家”视角，本文的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将分别借鉴相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初步探究刚果（金）前殖民时期和殖民时期的“碎片化社会控制”是如何形成并固化的。后来的历史表明，“碎片化社会控制”成为刚果（金）独立后国家构建进程中的结构性障碍。

### 三 前殖民时期刚果河流域的社会控制

根据简·范西纳（Jan Vansina）的研究，前殖民时期赤道非洲所有的政治体都来源于 5000 年前的一个原初政治体系。这一原初的政治体系诞生于班图人大迁徙中，其基本政治单元包括家庭、村庄和地区。其中，若干家庭出于经济和安全原因聚集在一起，形成村庄；在村庄之上，由于物品交换和通婚的需要，又会出现由若干村庄组成的地区。在范西纳看来，这一原初的政治体系的最大特征就是对政治集中的集体抵制，“在过去的 4000 ~ 5000 年，我们在这一地区（即赤道非洲）没有发现任何一般性的证据，能够清晰表明这一地区正在迈向更大范围的政治集中”。<sup>②</sup>人类学家认为，前殖民时期的非洲大陆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社会：一类是有国家社会，即拥有集中化权威、行政机器和司法制度的社会；另一类是没有出现集中化权威、行政机器和司法制度的社会，被称为无国家社会。<sup>③</sup> 有国家社会的政治组织形式又可进一步分为酋长地（chiefdom）

① Joseph R. Strayer, *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 16.

② Jan Vansina, “Pathway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Equatorial Africa and Neo-Evolutionary Theory”, in Susan Keech 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8.

③ M. Fortes, E. E. Evans-Pritchard, eds., *African Political System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0, p. 5.

和王国 (kingdom)。其中,酋长地类似于范西纳所说的“地区”,一般由若干个村庄组成,这些村庄共同认可一位酋长来行使冲突调解、维持秩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等职能。酋长地一般具有规模小和族群单一的特点。相比之下,王国的人口较多,地域规模更大,族群构成也更多样性。出于统治的需要,王国一般会发展出初级的统治机器,比如官僚机构、军队、法庭等。<sup>①</sup>

公元前 1000 年前后,班图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刚果盆地,大致同一时期,从尼罗河下游来的东非人也途经苏丹进入了刚果东部和非洲大湖地区。相互隔绝的地理环境,再加上人口稀少、交通不便以及疾病盛行,这些均导致前殖民时期的中部非洲地区并没有出现持续性的政治集中形式。与大多数撒哈拉以南非洲一样,前殖民时期的中部非洲也主要存在酋长地和王国这两种政治集中形式。在大部分地方,酋长地是村庄之上最为普遍的政治集中形式。迪迪埃·贡多拉 (Didier Gondola) 对刚果河流域历史上存在的酋长地有过如下描述。

酋长地由若干村庄组成。所有村庄头人中的老人都拥有一定的权威。之所以出现了村庄之上的组织结构,是因为在很多情况下产生了村庄之间关于土地的纠纷。酋长能够进行仲裁,防止此类事件发生,进而培育一种共同体感。一旦所有的村庄共同选择了一名酋长,他所在的宗族 (clan) 就自动具有贵族地位。此后,酋长便只能从该宗族中产生,除非明确规定酋长的职位要在不同村庄中间流转。酋长必须赢得尊重并展现出成熟的智慧。他还要秉公仲裁,以确保村庄之间的凝聚力。酋长地中的所有村庄每年都要上缴一定的贡品,以表明自身的忠诚。<sup>②</sup>

在前殖民时期的下刚果和开赛高原,一些对酋长地的征服活动造就了规模更大的王国,典型的例子有刚果王国、卢巴王国、隆达王国和库巴王国等。与酋长地相比,这些王国具备了更强的政治集中色彩。

首先,王国的规模更大。例如,鼎盛时期的刚果王国有六个省,统治着大约 300 万名民众。与王国的大规模相一致,王国的族群结构也更为复杂。在刚果王国,除了刚果人外,还有姆邦杜人 (Mbundu) 和恩贡贝人 (Ngombe)。在库巴王国,既有库巴人,也有卢巴人、蒙哥人和基特人

① George Ayittey, *Indigenous African Institutions*, New York: Transnational Publishers Inc., 2006, p. 124.

②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p. 14 – 15.

（Kete）等。卢巴王国与隆达王国都是松耶族人（Songye）通过征服建立的，它们在今刚果（金）东南部形成了一个广大的文化区域。由于其疆域辽阔，卢巴国王和隆达国王不得不向各地派出代理人，实行“间接统治”。<sup>①</sup>

其次，王国发展出了初步的统治机器。王国的较大规模和族群成分复杂这一事实意味着，有效统治的前提是建立一套统治机器。刚果王国建立了省—区—村的三级统治机构，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建立了区—村两级统治机构。在刚果王国，国王直接任命省和区的官员，并可以解除他们的职务；在庫巴王国，国王与一系列委员会共同统治。这些委员会由一些荣誉之士（titleholders）组成，他们之下则是 100 多位官员组成的政府；<sup>②</sup> 卢巴王国的中央政府由国王与荣誉之士组成，其中最重要的职位包括：军事领袖、军官团首领、重要的酋长、圣物保管员等。<sup>③</sup> 在隆达王国，国王的主要官员是来自 15 个最古老村庄的头人，国王还得到首都官员和乡村官员的协助。<sup>④</sup> 此外，这些王国都建立了规模不一的常备军，其中，在 15 世纪末，刚果王国的军队规模达到了 8 万人。<sup>⑤</sup>

最后，国王的资源汲取能力更高。由于建立了初步的统治机器，国王的资源汲取能力也要远高于酋长。在刚果王国，国王的收入包括税收劳役和贡赋等。国王每年征税一次，同时每年举行一次典礼，每个地方的官员都会带着贡品参加，以表达对国王的忠诚。<sup>⑥</sup> 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主要以纳贡的方式从生产和贸易中提取剩余物。同样，在庫巴王国，各个酋长地也必须定期向国王提供贡品和劳动力。

然而，在前殖民时期的中部非洲，任何集中权力的趋向都被无所不在的保持地方自主性的努力所遏制。甚至从一开始，连酋长地这样的政治形式都被一些社群所抵制。<sup>⑦</sup> 即便在王国，其权力集中程度仍旧十分有限。具体而言，权力集中的努力会遭到以下几方面的抵制。首先，国王

①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37.

② Jan Vansina, *Being Colonized: 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 1880 – 1960*,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 45.

③ Jan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 73.

④ Jan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 81.

⑤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28.

⑥ Jan Vansina, *Kingdoms of the Savanna*,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p. 44.

⑦ Jan Vansina, *How Societies Are Born: Governance in West Central Africa before 1600*, Charlottesvil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4, p. 202.

权力会遭到各种平行性组织的平衡。这样的平行性组织包括年阶组织、宗教组织、秘密社会以及宗族组织等。在刚果王国,国王由一个贵族组成的选举团推选产生,并且需要接受长老理事会的咨询,不可以自行其是。在库巴王国,所有的荣誉之士都是由其同行选举产生的,国王无权干预。由这些荣誉之士组成的各个委员会代表了首都和附近村庄的民众,对国王的权力形成制约。<sup>①</sup>在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尽管国王在理论上享有绝对权力,但是一些制度上的约束使得他不能够恣意为。如果他恣意为,他的兄长就会在宗族和皇室其他成员的支持下废黜他。<sup>②</sup>其次,国王的权力更多体现为仪式性权力而非世俗权力。在中部非洲的各个王国,国王首先是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首领,因而他们都具有神秘色彩。刚果国王被认为控制着降雨和作物,管理着耕种与收获,与刚果人精神世界中的众多神灵保持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库巴国王被期望提供安全保障,保佑庄稼丰收和六畜兴旺,并保护民众远离灾难。在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国王也被认为拥有超自然的能力。在这些王国中,国王在很大程度上享有仪式性权威,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政治权力或特殊的经济优势。<sup>③</sup>进而,国王的任何逾越行为也会被认为具有宗教意义,会给全体民众带来灾难,因而会遭到抵制。最后,民众始终保持“用脚投票”。撒哈拉以南非洲土地资源丰富这一事实,使得普通人能够通过迁徙逃离滥用权力的国王和酋长。正因如此,在前殖民时期的中部非洲,国王和酋长们的权力更多体现在对人的控制(吸引到更多的追随者)而不是对土地或财富的控制上。<sup>④</sup>

因而,前殖民时期中部非洲的社会控制存在两个突出特点。一是

① Jan Vansina, *Being Colonized: 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 1880 – 1960*,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 46.

②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38.

③ Susan Keech McIntosh, “Pathways to Complexity: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Susan Keech 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3.

④ “用脚投票”与某些研究非洲社会的人类学家提出的“基于人的财富”(wealth-in-people)概念密切联系在一起。与“基于东西的财富”(wealth-in-things)不同,“基于人的财富”主要指的是非洲社会的精英通过增加自己追随者的数量来获得地位、权力和影响力的现象。在前殖民时期,非洲精英之间的竞争主要是“对追随者的竞争”。见 Susan Keech McIntosh, “Pathways to Complexity: An African Perspective”, in Susan Keech McIntosh, ed., *Beyond Chiefdoms: Pathways to Complexity in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6.

“社会控制程度的不足”。由于缺乏持续性的政治集中形式，民众的社会生活基本上依靠习俗和血缘关系调节，在大多时候并不面临任何外在权威施加的规则，民众具有很强的“未被捕获”特征——“用脚投票”选项的存在使这一特征更加明显。二是“社会控制的碎片化”。一方面，村庄和酋长地数量众多，规模很小，但其规则体系不同，社会控制的内容和方式迥然各异；另一方面，王国存在的时空范围均有限，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已有的社会控制，尤其是考虑到任何集中权力的趋向都被无所不在的保持地方自主性的努力所抵制。在库巴王国，离布尚酋长地（王国的核心区）越远，国王的影响力就越小，而民众的不服从现象就越频繁。<sup>①</sup>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刚果王国、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社会控制分散于无数酋长和地方强人手中，必然带来社会控制的碎片化。更为严重的是，从15世纪开始，刚果河流域成为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重灾区，而奴隶贸易进一步动摇了国王的政治权威。例如，刚果国王阿方索曾于1526年致信葡萄牙国王，请求后者撤回奴隶贩子和商人，因为刚果王国的酋长们通过奴隶贸易获得了大量财富，越来越不服从国王的命令。当比利时人在19世纪末加速对刚果河流域殖民化时，刚果王国早已于两个世纪前亡于奴隶贸易和葡萄牙人的干涉，而卢巴王国和隆达王国则在阿拉伯奴隶贩子和奥文本杜人的侵袭下奄奄一息。只有库巴王国还勉强维持着王国的架构。然而，殖民统治的到来却进一步加剧了刚果河流域社会控制碎片化的状况。

#### 四 遭遇殖民化：碎片化社会控制的加剧与固化

与其他在非洲的欧洲殖民者不同，比利时在刚果（金）的殖民统治分为两个阶段，即刚果自由邦时期（1885～1908）和比属刚果时期（1908～1960）。尤其在刚果自由邦时期，比利时人的殖民统治以残暴著称。1885年柏林会议将刚果河流域确定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个人财产”，后者旋即宣布成立刚果自由邦，由此开启了刚果河流域的殖民时代。

---

<sup>①</sup> Jan Vansina, *Being Colonized: 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 1880 - 1960*,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 50.

### (一) 刚果自由邦时期

对于利奥波德二世而言,刚果自由邦首先是一项经济投资,能否尽可能榨取经济资源是这项投资成功与否的关键。在 1885 年柏林会议上,欧洲列强同意利奥波德二世成立刚果自由邦的一个前提条件是“确保刚果的自由贸易”,这就意味着利奥波德二世无法对刚果的进口商品征收关税。为了尽快收回前期建立刚果自由邦的支出,利奥波德二世于 1885 年颁布命令,宣布刚果自由邦所有没有被有效占领的土地为“国家所有”。由于当时刚果河流域大部分地区实行的是轮耕制,很多休耕土地因此被视为“国有土地”。此外,为了尽快榨取刚果的经济资源,利奥波德二世引入了特许公司制度。

所谓特许公司制度实质上是利奥波德二世与特许公司之间的一种利益交换。简言之,利奥波德二世将特定土地上的资源开采权和贸易垄断权授予特许公司,而后者则支付一定比例的税收并承诺代为履行对殖民地的某些统治职责。为了尽快吸引更多的欧洲投资者,利奥波德二世给予特许公司的条件是极为优厚的。例如,为了获得昂潘公司(Empain Group)对刚果铁路建设的投资,利奥波德二世将四百万亩土地给予该公司。昂潘公司还可将这些土地以及土地上的矿产开采权给予第三方。1892 年成立的加丹加公司(Compagnie du Katanga),被赋予了加丹加地区的矿产开采垄断权。同样,在利奥波德二世的授意下,1901 年成立的开赛公司(Compagnie de Kasai)获得了开赛地区橡胶和象牙贸易的垄断权。

特许公司制度为刚果地区带来了惨痛的后果。由于当时刚果河流域主要是农业经济,贸易规模很有限,经济的货币化程度不高,因此,特许公司便通过征收人头税和强制劳动来榨取当地的经济资源。在特许公司享有特定地区贸易垄断权的情况下,非洲人不得不将采集的橡胶和象牙以极低价格出售给特许公司,以支付人头税。贸易垄断权为特许公司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例如,在 1898~1903 年,英比印度橡胶与勘探公司(Anglo-Belgian India Rubber and Exploration Company)从刚果的橡胶贸易中获利近 1 亿美元。<sup>①</sup> 特许公司的首要目标是最大化地榨取刚果的经济资源,为此,它们不惜直接采取强制措施。在开赛公司,欧洲的经理和办

<sup>①</sup>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72.

事员随意从非洲人上缴的货品中提取一部分作为生活开支，存在腐败现象。同时，他们还尽可能压低橡胶的收购价格，导致每次征收橡胶都充满冲突。<sup>①</sup> 特许公司压榨非洲人的另一手段就是强制劳动。当非洲人无力上缴足够的橡胶或象牙支付人头税时，殖民者就会选择直接榨取他们的劳动。刚果河流域的各个特许公司普遍出台了这样的规定，即每个土著每年至少要为特许公司义务劳动 60 天。<sup>②</sup>

特许公司制度加剧了刚果河流域社会控制碎片化的状况。一方面，在暴力机器的支持下，特许公司从根本上改变了本土民众的生存策略，成为新的社会控制的来源。但是，特许公司带来的社会控制本身就是碎片化的：特许公司数量众多，它们在殖民地的不同地方推行着不同的规则；更为重要的是，刚果自由邦没有制定任何规章来约束特许公司的权力，在现实中这就导致每个特许公司官员都同时是规则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甚至非洲人应当缴纳的税收都是由殖民官员“因地制宜”确定的。<sup>③</sup> 另一方面，特许公司制度还进一步摧毁了刚果社会原有的社会控制。库巴王国是当时唯一在奴隶贸易的打击中幸存下来的王国。但是，开赛公司的统治从根本上动摇了库巴国王的统治。开赛公司在库巴王国引入了大量的卢卢阿人和卢巴人，而这些移民对国王充满敌意并公开反对国王。在开赛公司的胁迫下，库巴国王很快成为殖民者的统治工具：他从开赛公司那里领取津贴，建立起了一支 70 人的保安队伍，强迫库巴人向殖民者提供橡胶。结果国王原先享有的社会控制很快流失殆尽。1907 年爆发了库巴民众公开反叛国王的起义，因为他们意识到国王没能履行自己的职责，不再保护他们。<sup>④</sup>

刚果地区传统的社会控制在奴隶贸易的打击下早已分崩离析，而利奥波德二世的统治更加剧了当地社会控制碎片化的状况。凯萨·埃克霍尔姆-弗里德曼（Kajas Ekholm-Friedman）在谈到刚果自由邦时期的下刚

① Jan Vansina, *Being Colonized: 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 1880 – 1960*,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 70.

② Crawford Young, “Zaire: The Shattered Illusion of the Integral State”,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4, 32 (2), p. 253.

③ Ewout Frankema and Frans Buelens, eds., *Colonial Exploit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elgian Congo and the Netherlands Indies Compared*, London: Routledge, 2013, p. 71.

④ Jan Vansina, *Being Colonized: The Kuba Experience in Rural Congo, 1880 – 1960*,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2010, p. 48.

果地区时写道：“下刚果地区的殖民化导致了权威结构的严重动荡。政治等级制崩塌，酋长们失去了权力，宗教权威被削弱……他们复杂的崇拜体系和高度一体的宗族或部族体系失去了作用。”<sup>①</sup>与此同时，刚果自由邦发生的人道主义灾难还引发了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国际性的人权运动。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利奥波德二世不得不于 1908 年将刚果殖民地转交给比利时政府管理，由此拉开了比属刚果的序幕。

## (二) 比属刚果时期

比利时政府接手刚果殖民地之后，面临两大突出问题：一是刚果自由邦时期社会控制碎片化加剧的现实，二是刚果殖民地的族群多样性和庞大规模带来的统治难题。正如罗杰·安斯蒂（Roger Anstey）所指出的，“比利时继承的不只是一个殖民地，还是一个有着特定结构的殖民地：稀疏的人口以及被破坏的习俗社会；庞大的、未能得到有效管理的领土；直接的经济剥削的体系，不受约束的特许公司制度；各种权力滥用和惨案。同时，对于刚果，比利时没有相应的政策传统可资利用，也没有确立积极的目标”。<sup>②</sup>为了应对这两大问题，比利时殖民当局引入了一系列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这也使得比利时的殖民统治呈现了不同于英国和法国殖民统治的一些特点。

首先，以酋长为基础的“政治监护制”。在非洲，法国“直接统治模式”和英国“间接统治模式”分别以同化政策和自治政策为基础，与此不同，比利时在刚果引入了一种政治监护制，其基本内容就是本土酋长在比利时人的直接监督下实行“间接统治”。根据殖民当局分别于 1906 年、1910 年和 1933 年颁布的三份关于地方殖民政府的法令，酋长地是比属刚果殖民统治大厦的最低层级，酋长成为从属于殖民当局的基层官员。如前所述，奴隶贸易和刚果自由邦时期的殖民统治破坏了本土社会原有的政治权威结构，加剧了社会控制的碎片化，这使得殖民者不得不人为制造出很多酋长地，以便假装能够在所谓的“前殖民时期的传统政治结构下”进行间接统治。<sup>③</sup>在实践中，这就导致酋长地的数量很多而规模普

① Kajas Ekholm-Friedman, *Catastrophe and Cre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an African Culture*, Chur: 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1991, p. 255.

② Roger Anstey, *King Leopold's Legacy: The Congo Under Belgian Rule, 1908 - 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261.

③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79.

遍较小。例如，在1917年，比属刚果共有6095个酋长地，而每个酋长地的人口平均不超过1000人。<sup>①</sup>

根据殖民当局1910年法令，比属刚果所有的酋长必须得到殖民当局的承认。这就意味着，殖民当局在实践中掌握着对酋长的任命权。那些不服从殖民当局的本土酋长会被替换。一旦这种情形出现，殖民当局就会派出专人收集当地宗族的信息，进而确定新的酋长。<sup>②</sup>作为对支持殖民当局的回报，酋长们被要求承担一系列义务，包括征税、动员劳动力、执行殖民当局关于农作物种植的政策、为矿井和种植园强制招募劳工以及为殖民当局征兵。<sup>③</sup>在这种制度安排下，酋长很快就堕落为殖民当局的统治工具，失去了其原本享有的社会控制。1920年，比利时殖民部部长路易斯·富朗克（Louis Franck）曾对社会控制的碎片化和酋长权威流失的状况忧心忡忡：“酋长以及次级酋长（Sub-Chiefs）的数量之多以及权威之分散，是一种恶和危险。酋长地太小了，很多酋长根本没有任何权威可言。酋长们先前获得服从的情形现在消失不见了……如果酋长不再能够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法官，那么，他们将失去自己的权威。”<sup>④</sup>

其次，对于殖民地的超常经济掠夺。1908年的《殖民宪章》（Colonial Charter）规定了刚果殖民地财政自给的原则。为了偿还利奥波德二世时期的巨额债务，比利时殖民当局只能加强对刚果殖民地的经济掠夺。从1914年开始，不缴纳人头税的土著会被判入狱。殖民当局还引入强制劳动和强制种植政策。1917年，殖民当局要求每位刚果人必须每年为殖民当局“自愿劳动”60天。农业官员为每位农民配置土地，如果农民拒绝“自愿劳动”就会面临惩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殖民者又引入了强制棉花种植政策，并对不服从的土著进行惩罚。1947年比利时议会的调查团发现，当年有10%的刚果成年男性曾被关入监狱，主要罪名是违反农业条例。<sup>⑤</sup>

由于殖民当局的超常经济掠夺必须依靠酋长才能实现，这在一定程

①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79.

②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79.

③ Crawford Young and Thomas Turn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Zaire Stat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 36.

④ Roger Anstey, *King Leopold's Legacy: The Congo Under Belgian Rule, 1908 - 1960*,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p. 62.

⑤ Crawford Young, "Background to Independence", *Transition*, 1966 (25), p. 35.

度上增强了殖民当局对酋长的依赖性，酋长的权力地位因此得以提高。这一趋势尤其在设立区酋长 (Sector Chief) 后更为明显。为了减少酋长地的数量，提高行政效率，殖民当局于 1922 年开始将刚果东部的一些酋长地合并为区，后来这一改革被推广到了殖民地其他地方。每个区都由一位酋长进行统治，由本地贵族组成的委员会予以协助。除了征税、负责司法与警局、维护道路等日常工作外，区酋长拥有了比酋长地的酋长更大的权力。例如，殖民当局赋予他们独立的预算权，定期接受法院罚款、税收收入以及政府的补贴。在区酋长之下，建立了完整的政府和社会机构，包括秘书处、法庭、财政部门、警局、农业部门、学校、医院等。<sup>①</sup> 权力的扩张使酋长们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强人”，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土著的生存策略，形成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这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碎片化社会控制的加深和固化。

最后，对于刚果民众系统性的政治排斥和权利剥夺。英国很早就在其非洲殖民地（尤以黄金海岸为典型）引入地方自治改革，赋予殖民地民众更多的政治参与权。法国也积极赋予殖民地一些政治权利，比如法属非洲殖民地很早就可选举代表参加法国国民大会，非洲民众也可获得法国公民权（尽管资格门槛很高）。与英法两国相比，比利时在非洲的统治具有更强的威权主义色彩。这主要是由于比利时殖民统治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对刚果的经济掠夺，所有制度安排和政策设计都要围绕这个最终目标。在殖民时期的比属刚果，本土人面临着系统性的政治排斥。1908 年的《殖民宪章》明令禁止刚果人组织任何政治活动，严格限制民众集会。关于刚果殖民地的所有重大决策都是由总督和布鲁塞尔的殖民部决定的，本土民众没有任何发言权。例如，尽管政府委员会 (Government Council) 仅是殖民当局的一个咨询机构，但它在 1947 年也只有两名黑人代表。<sup>②</sup> 殖民时期的比属刚果有着非洲第二大规模的工人队伍，但是殖民当局却极力限制黑人工会的发展。1954 年，比属刚果只有不到 1% 的工人加入了工会，而同期的法属西非是 23%，北罗德西亚是 25%，尼日利亚更是达到了 50%。<sup>③</sup> 与此同时，殖民当局还系统性地限制刚果

①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80.

② Jeanne M. Haskin, *The Tragic State of the Congo: From Decolonization to Dictatorship*, New York: Algora Publishing, 2005, p. 13.

③ Georges Nzongola-Ntalaja, *The Congo from Leopold to Kabila: A People's History*, London: Zed Books, 2002, p. 76.

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例如，为了保证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动员非洲的劳动力，殖民当局严格限制刚果人自由迁徙。如果土著要迁徙到另外的地方，需要殖民当局发放的通行证。<sup>①</sup> 为了防止刚果人产生统一的民族意识，殖民当局禁止刚果人成立除族群组织之外的任何其他组织，同时严格控制刚果人的受教育机会和社会上升通道。殖民时期刚果人所能获得的最高职位是办事员，而在独立之前，只有不到 30 位刚果人接受过高等教育。<sup>②</sup>

结果，在比属刚果时期，刚果社会控制碎片化的状况不仅没有改观，反而进一步固化。酋长作为殖民统治机器一部分的事实以及殖民当局对酋长依赖的增强，扩大了酋长们的权力，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地方强人”。为了提升酋长的权力地位，殖民当局还将各地的习俗法成文化，这反过来也固化了碎片化的社会控制。更为重要的是，系统性的政治排斥和权利剥夺压制了刚果人改变社会控制碎片化的能力。由于没有政治参与的权利，他们难以影响殖民当局制造和强化社会控制碎片化的决策过程。由于没有自由迁徙的权利，他们难以保持前殖民时期存在的“用脚投票”的选项，无力约束酋长们肆无忌惮的权力。由于没有政治结社的自由，他们也无力建立任何超越族群界限的组织，这使得刚果社会缺乏整合性的力量来弥合社会控制碎片化带来的社会分裂。事实表明，所有这些都为独立后不久就爆发的刚果危机埋下了伏笔。

## 结 语

通过“社会中的国家”的理论视角并基于相关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成果，本文初步探讨了“碎片化社会控制”如何出现于前殖民时期的刚果河流域，以及其如何在殖民时期被进一步加剧和固化。后来的历史表明，“碎片化社会控制”构成了刚果（金）国家构建进程中的极大障碍。它不仅阻碍了殖民时期的刚果社会产生任何“共同体感”，而且赋予前殖民时期的认同以新的政治社会意义，并引发社会冲突。例如，早在刚果

① Didier Gondola, *The History of Congo*,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2002, p. 88.

② B. Jewsiewichi, “Belgian Africa”, in A. D. Robert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Africa (1905 - 1940)*, Vol. 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490.

自由邦时期,开赛东部地区的松耶人就成为比利时殖民者的帮凶,并在 1899 年实施了针对库巴人的大屠杀。而殖民当局系统性的政治排斥和权利剥夺压制了刚果人改变社会控制碎片化的能力。例如,殖民当局在 1950 年前一直禁止除部族以外的其他组织形式,这使得部族成为唯一可能的动员工具,进而导致去殖民化进程中族群关系的政治化。在刚果(金)独立前夕的 1959 年,开赛省的卢巴人与卢卢阿人之间还发生了现代非洲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族群清洗事件。

碎片化的社会控制、缺乏整合的经济体系和政治精英内部的分裂,加上仓促的去殖民化进程以及美苏战略竞争的冷战背景,所有这些都促使刚果(金)的独立进程最终演变为一场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博托后来的独裁统治不过是刚果(金)政治精英(以及一定程度上整个刚果社会)对刚果危机做出的反应。但是,蒙博托的解决方案——无论是构建庇护网络、推行“激进化”“扎伊尔化”政策还是成立全民党,均无力根本解决刚果(金)历史上形成的“碎片化社会控制”这一深层次问题。正如米格代尔所言,“国家领导人优先目标的改变(生存压倒社会变迁)、国家政治的表现样态(大改组、阴谋诡计等等)、国家组织的结构(烦冗的国家机构)、政策执行的困难、政策执行者面临的压力、国家机构被(社会)捕获——所有这些都源于碎片化的社会结构”。<sup>①</sup>

本文的论述表明,国家构建并非发生于真空之中,而是要受到特定社会结构和历史经历的极大制约。相应的,对脆弱国家的研究必须把“历史”带进来。本文对当下脆弱国家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提出挑战。

第一,脆弱国家研究中的指标化倾向。对脆弱国家的研究从一开始就充满了“经世致用”的实用主义倾向。这尤其体现在研究者们热衷于提出各种测量国家脆弱性的指标。除了上文提到的美国和平基金外,“国家失效研究小组”(State Failure Task Force)、危机国家研究中心(Crisis States Research Centre)、“体系和平研究中心”(Center for Systemic Peace)、世界银行、英国国际发展部以及一些学者都发布过衡量国家脆弱性的指标体系。<sup>②</sup> 这些指标体系无疑都有其价值,但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比

① Joel S. Migdal, *State in Society: Studying How States and Societies Transform and Constitute One Anoth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93.

② 关于各种测量国家脆弱性的指标体系的介绍,详见闫健《失效国家研究引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 年第 3 期,第 100~109 页。

如，不同指标体系之间缺乏沟通，导致相关研究缺乏共识和碎片化；指标的操作化困难，导致某些指标尚且不具备基本的描述功能，遑论（指标设计者们所期待的）预测功能。尤其是，它们将不同国家置于同一指标体系下进行衡量和比较，无意中压缩了国家构建进程中可能存在的不同历史轨迹，不利于研究者从国家构建的长历史视野审视国家脆弱性问题。

第二，脆弱国家案例研究中的“当下主义倾向”（presentism）。<sup>①</sup>以学术界对刚果（金）国家脆弱性的已有研究为例，大多数研究均聚焦于蒙博托时期，只有很少研究者会提及殖民时期的历史遗产，<sup>②</sup>而几乎没有人关注前殖民时期的历史经历。这种“当下主义倾向”大大缩短了国家构建的历史“时间轴”，容易导致对不同历史时期国家构建历程的割裂式理解，不利于研究者深入剖析不同国家构建进程背后的特殊历史轨迹。

将“历史”带进来的另一含义是要充分理解脆弱国家问题出现的特殊历史背景。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普遍经历了四个到七个世纪，这使得早期的欧洲国家有着充分的时间应对国家构建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相比之下，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得不以更快的速度推进国家构建进程。这一现实与战后联合国强调国家资格（statehood）的法律形式有直接的关系。《联合国宪章》确立了“主权平等”原则，使得新生的非洲国家获得了与西方国家平等的国际法地位。在联合国的推动下，非洲前殖民地在去殖民化运动后自动获得了平等的主权地位。与早期欧洲国家不同，这些新生的非洲国家不再需要赢得主权，而是（天然地）享有主权。<sup>③</sup>然

① 事实上，“当下主义倾向”不仅存在于非洲脆弱国家的案例研究中，在整个非洲史研究中都是一个突出问题。如雷德和帕克所言，“非洲史研究中存在一种过度缩短非洲历史的倾向，甚至是研究 19 世纪非洲史的学者都感到自己属于一个很小且被边缘化的群体”。详见 Richard Reid and John Parker, “Introduction to African Histor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in Richard Reid and John Park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 African Hist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 10。

② 例如，在《扎伊尔国家的兴起与衰落》一书中，杨和特纳用了半章的篇幅讨论扎伊尔国家的“殖民起源”问题。见 Crawford Young and Thomas Turner,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Zaire Stat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pp. 31–41。

③ Robert Jackson, “The Weight of Ideas in Decolonization: Normative Chang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Judith Goldstein and Robert Keohane, eds., *Ideas and Foreign Policy: Belief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Chang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17。

而,这种强调国家资格的法律维度的倾向却无意中缩短了国家构建的“时间轴”,忽视了实际国家构建进程的复杂性和历史性。从这个意义上看,刚果(金)的国家构建历程不过是战后国际规范超前于历史与现实的又一例证。

【责任编辑】李鹏涛

## Table of Contents & Abstracts

### The Evolution of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and Its Indigenous Approach

*Guan Peifeng, Sun Xiaohan / 3*

**Abstract:** Since African countries gained independence, the issue of peace and security has always been the biggest obstacle restricting the development of countries, and countries are also constantly exploring local solutions to internal conflicts in practice. In this context, the concept of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came into being. Influenced by the ideas of Pan-Africanism and African Renaissance,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highlighted Africa’s strong desire to play a leading role in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and its connotation is constantly clarified in practice. Although this concept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at the practical level, with the continuous enrichment of relevant cases, the African continent has shown more and more distinct indigenous propositions in resolving internal conflicts.

**Keywords:** African Solutions to African Problems; Pan-Africanism; Africa Renaissance

### Social and Historical Origins of State Fragility: A Case Study o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Yan Jian / 19*

**Abstract:** The state failure wave in Africa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brought the problem of state fragility to the fore, which had long been hidden behind the facade of equal sovereignty of states. By taking the “state in society”

perspective and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representative studies in anthropology and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the fragmented social control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DRC), formed during the pre-colonial period and substantially expanded and solidified during the colonial period, shaped and constrained the state building trajectory of DRC after the latter's independence. This article concludes that state building does not take place in vacuum and it tends to be shaped by specific historical experiences of a given country. The findings of this article echo the "historical" turn in social science studies in recent years.

**Keywords:**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he Congo; "State in Society"; Colonial Rule; Social Control; Chiefs

##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Development of African Constitutions

*Huang Mudan, Hong Yonghong / 41*

**Abstract:** Since independence, African countries have gone through more than 60 years in the exploration of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systems. During this period, the constitutional and legal systems of African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four periods including imitation, reform, transformation, and reshaping, each with correspo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is process, African countries have basically realized the construction of citizens' constitutional rights, the construc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power, and the appropriate restriction of administrative power. African countries have made great progress in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minent problems. The causes for these problems include the decisive rol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hanges in domestic political forces,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group forces, and excessive external interference, etc. African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firmly follow the path of democracy, s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odel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in the constitutional process, diversified constitutional management, the reform of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nd branche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overnment system and electoral system will be the focus of refor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frican Country; Constitution; Election